

重新认识中世纪天主教的历史地位

——《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读后

刘景华

基督教、西欧,这是一对人们能极其自然将之联系在一起的名词。论及基督教,必谈西欧,似乎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并没有不对,问题是,基督教自产生后对西欧社会发展究竟有多少正面和负面影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的研究者不计其数,研究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而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基本认识却并不那么全面,甚至是十分偏颇的。它们基本上否定了天主教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了。武汉大学安长春教授的近作《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之出版,有助于扭转这种片面的看法,有助于对西欧社会发展中的天主教进行重新定位。

这部研究性很强的学术专著,以通达流畅的文笔,向读者展现了近代以前一千多年时间里基督教在西欧发展的历史长卷。作者对“产生于巴勒斯坦犹太人中的基督教怎样在西欧落地生根,怎样使西欧人普遍接受为信仰,怎样成了主宰西欧社会的势力,以及在基督教笼罩下,西欧社会如何迟滞与进步、文明制度所具有的宗教特色”等问题所作的描述和分析,以别开生面的述说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从宗教角度观察西欧的知识”,予人启发良多。不唯如此,该书在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也有很多独到之处,颇具说服力的精彩论述时时可见。譬如,在论述基督教战胜罗马帝国的原因时,对基督教所具有的种种独特的征服力和诱人处的剖析;对所谓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有无责任问题的评论;对西欧迅速基督教化的原因和过程的描述;将经院哲学视为天主教神学中的理性因素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作者以宽广的视野,将基督教置于西欧社会大背景中考察,得出的结论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这在以往国内的基督教史著作或西欧史著作中很难见到。尤其是作者从若干方面对天主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发展之关系的客观论析,从一定意义上为我们对这一问题构建新的认识框架奠定了基石。

基督教既然为罗马国教,帝国衰亡了,它也理应销声匿迹。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在日耳曼蛮族扫荡西欧大陆的铁蹄下,基督教却奇迹般地渡过危机,并迅速转变为新时代的统治宗教,而且在中世纪确定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地位。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基督教自身为适应新形势所作出的调整和所谋求的发展至关重要。作者对此多有论及。

诚如作者指出:“中世纪天主教会权势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罗马教皇权势的膨胀”,而教皇权势的增长,正是它本身善待机遇、顺应潮流、审时度势、努力塑造自我形象的结果。教皇原只是罗马城的主教,由于政治上地处帝国都城得天独厚的关系,它特别热衷于“组织和权力”。其中利奥一世声称罗马主教乃耶稣大弟子彼得之继承人,理当为众主教之首,从此便“自视为基督教会的首脑”。格里高里一世作为第一任教皇,励精图治,整顿教会,规范神职人员行为,从而“成功地树起了教皇权威”。继而更有尼古拉一世、利奥九世、格里高里七世这样一些有作为的教皇,一步一步地发展着教权。以至于到13世纪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教皇权势达到了顶点,俨然为“世界之王”,一统西欧、北欧精神世界之天下,“与其时这一地区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王权无力的政治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为保持信仰的纯洁,基督教又具有较好的自我净化机制,这就是作者用较多篇幅论述的修道制度。修道的目的,是想“通过自我节制情欲以达到灵魂得救”。修道制度本源于东方埃及,在西方经历了受罗马文化改造的过程,适应了新的社会条件,并且在教义上形成了“依靠自己的工作而生活”、“重视条理和实践”的特点。此后,修道制度在中世纪历经本笃修道会、克吕尼派、西斯妥西安派、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不断地自我扬弃。其结果,尽管上述诸教派最后都走向腐化、走向衰败,但“反映了天主教会内部试图通过克服自身的世俗化,以保持天主教正统教义和天主教会地位的一再努力。”每一次努力都吹出了一股清新之风,使得天主教能不断产生对社会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教会在思想上的权威也是逐步形成的。罗马帝国末年,由奥古斯丁等神学家创立的教父哲学,经历次宗教会议的推崇,最后由罗马主教卜尼法斯二世批准,登上了权威神学之宝座。教皇的意图很明确,因为“提倡盲目信仰、否定思考的教父哲学,为神化教皇、抬高教权,为天主教会建立神学专制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神学依据。”同时,教皇又宣称一般人无法理解圣经,只有教会是圣经最适当的阐述者。于是,教皇便“依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圣经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然后据以建立教理、制定教规,为其最高权威与专制寻找圣经的支持,使教皇权威神圣化”,并逐渐以教皇权威取代圣经权威。特别是教皇所渲染的救赎理论,更使上帝对信徒的赦罪权转移成了教会神职人员手中的实际权力。当宗教异端兴起、对天主教正统造成强大冲击时,教会为顺应形势,也在神学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将理性引进天主教神学殿堂,将已不适时的教父哲学改造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实际上是天主教会对其神学自我反省的结果,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后”,将其“拿来论证教义、使教义换上新的面目,以适应理性发展的社会潮流”,“不靠神启而凭理性追求真理”的方法,明显地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最后,终于由托马斯·阿奎那“把经院哲学推向极致”,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包含有理性内容的神学体系,从而结束了前此数百年的盲目信仰时代。由此看来,中世纪天主教至高无上精神地位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内在的自我调整与完善机制作用的结果。

不能离开基督教来谈中世纪西欧政治的发展,这是我们读完本书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中世纪西欧的主人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原本是作为罗马帝国的敌手出现并进入西欧的,因此他们最初信奉的是正统基督教的对立面,即作为基督教异端的阿利乌斯派。但是,如果他们在入主西欧后继续维持原有的信仰,那就必然会同信奉正统基督教的居民形成隔阂,引发冲突,最后导致自身的衰亡。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都没有逃脱这一命运,本书作者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而在克洛维率领下接受洗礼皈依正统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则由于得到教会的支持,在6世纪后期一跃而为西欧最强大的日耳曼人国家。在那里,“教会成了政府的支柱”,国家则报之以桃,保护基督教,强制推行基督教,提高教会的社会地位。查理大帝时代,更是“实行武力与基督教并用政策,征服到哪里,基督教会的势力就伸展到那里。”其后的德意志国家,视基督教为王朝统治之支柱,并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用武力将其带到中欧、东欧和北欧。可以说,是否信仰基督教是中世纪初期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西欧政治分野的一个主要原则。

看起来,作为天主教首脑的罗马教皇与世俗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教权与俗权之争,实际上这种争执正是在两者相互依赖的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作者所指出:“基督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日耳曼人以信仰,还给日耳曼人国家以新的神圣性”,“基督教会给国家以政治上、精神上的保证”。特别是由教皇和教会对世俗国王进行的敷油与加冕仪式,又为国王蒙上了一环神圣性的光圈,君权神授观念实际上由教会授予王权以神圣性的做法来体现。某些世俗君王可以攻击和否定其个具体的教皇,但却不敢否定教皇之权威。在更多的时候,世俗君王要依赖教会和教皇。矮子丕平有了教皇的支持而篡国成功,查理大帝由教皇加冕方成为威加四方的“罗马人皇帝”。天主教会崇尚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在整个西方传播着“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这种带有宗教动机的努力,为西欧结束封建战争,争取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的局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世纪早年,西欧大地经日耳曼人的蹂躏之后,经济上一片残破景象,本书作者通过分析大量的材料后认为,天主教会为西欧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国内学界以往很少予以关注。

首先,中世纪时代西欧农业的进步,离不开天主教会的努力。基督教产生于农本经济时代,因此“不论

其经济思想，还是宗教伦理观念”，都“重视农业，以农为本，这对于教会参与农业开发、改进农业管理是重要的推动力”。教会占有大量的地产，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土地来源于教会人员自身的辛勤开发。11至13世纪西欧开垦森林、荒地和沼泽、扩大耕地面积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修士们起的带头作用。罗马时代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也多是教会和修道院保留了下来。每一所修道院，基本上便是一个模范田庄，它保存了罗马田庄的外表，并依照习惯的方法进行农作。教会进行过谷物和畜种的改良，还编写关于农业指导和耕作方法一类的农书。即使是作为中世纪农业技术最显著进步之标志的三圃轮作制，最早也是在教会庄园中流行，而且其推行过程也离不开修道院的作用。

商业以谋利为目的，看似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原则，因此常听到教会人士不绝于耳的斥责声。但作者辩证地指出，由于商品经济的魔力，天主教会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矛盾角色。一方面它不断谴责商业和高利贷行为；另一方面，教会神职人员又经受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醉心于追求财富。作者列举了不少材料来说明教会和修道院经营工商业，保护工商业的具体事实。东方商人操纵中世纪西欧商业的局面被改变，西欧商人最后夺取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都离不开教会的作用。与工商业相关的城市兴起，作者也剖析了教会对此的影响。教会限制的只是一般信徒的牟利活动，而自身作为“法人”的经济行为，却被百般地辩解和保护。

虽然说5至10世纪是西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黑暗时代”，但这决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基督教会，主要是粗野的日耳曼人入侵所造成的恶果。中世纪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是基督教，反过来说，基督教又是将中世纪与古代文明联系起来的唯一桥梁。正如作者指出，基督教会作为文化的掌握者，是西欧重建新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野蛮的日耳曼人正是从基督教那里获得“较高层次的文化营养”，才变得有一些教养。

作者列举了大量教会和修道院人员保存罗马文化的材料。正是由他们的行为开创了由修道院储存古代文化知识的先例，使其能经过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仍留传于后世。这些教会人士保存古代文明功不可没。后来他们还来到德意志及北欧中欧等地，一面传教，一面逐步掌握了各地的文化事业。对此，作者正确地援引了西方学者的结论：“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只有通过教会，……古典文化传统……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中世纪初期由教会独掌文化的状况，也就顺理成章了。

鉴于神职人员文化修养普遍低下的状况，教会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力主大办教育，并且还寻求国家的支持。所谓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查理大帝延揽修道院出身的学者来办教育、兴文化。当时一些有名的学校也多附设于修道院。修道院教习六艺，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在查理大帝等人的倡导与推动下，西欧逐渐建立了一套“与基督教相适应的新的教育制度与体系，结束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几百年无教育的时代”。11世纪后西欧又一次兴起了办教育的高潮，一批新修道院及附设学校被建起，教会和修道院仍然是文化教育的中心。

也有不少教会人员成为新思想的拥有者和正统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挑战者。9世纪后，对天主教的发展者不乏其人，但均来自于教会内部。最初是爱尔兰的约翰·司各脱，后来有法国的贝伦加尔、罗塞林、阿贝拉德，都是高扬理性旗帜的著名思想家。更往后的经院哲学家中，有罗哲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康等大思想家，坚定地提出了反天主教传统的主张，促成了天主教会内百家争鸣气氛的形成，推动了天主教神学的自我完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理性反对盲目信仰、反对天主教宗教桎梏的时代即将到来。由此可见，源自于教会内部积极的思想因子，是导致天主教变化与改革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 吴友法）